

高校医学生拖延行为与应对方式的差异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郭融融

广西科技大学

DOI:10.32629/er.v3i7.2949

[摘要] 高校医学生学业压力较普通高校学生大,受此影响,他们的拖延水平也更高。拖延行为表现在学业拖延,生活拖延等多个方面,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业。由于出生地、年级、是否任学生干部等客观原因,每个学生应对拖延的方式差异较大。为了帮助高校医学生拜托拖延困扰、提高正确应对方式的效果,本文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随机分层抽取800名广西不同地区的高校医学生进行量表填写,对样本学生的量表数据进行两个项目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剖析当前高校医学生拖延行为和应对方式的基本关系。

[关键词] 高校医学生; 拖延行为; 应对方式

1 拖延和应对方式概述

1.1 拖延概述

拖延,英文为procrastination,是任何社会群体普遍存在的行为,较为常见。学生群体的拖延主要表现在学业上。存在严重拖延行为的个体会因为其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后果产生负向情绪,如沮丧、抑郁、悲观等,赵婉黎等^[1]研究者认为,学业拖延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可能是因为学习者认知、情绪与行为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拖延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还会减少对学术的热爱,而且会在拖延的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忧心、烦躁、抑郁等负面情绪^[2]。因此,考察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业拖延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1.2 应对方式概述

应对方式,英文为coping style,是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或应激事件时使用的一种心理策略、方式和措施。应对方式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有学者指出,应对方式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跨情景一致性,但是个体的应对形式中有一些稳定的应对方式。^[4]应对方式有多种分类,主动型和回避型,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该简单的将应对方式简单划分,多数的应对方式是对个体有价值的,要根据不同的时间、情

表1 不同家庭所在地的拖延行为差异比较

	家庭所在地	N	均值	标准差	t	p		年级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	
拖延行为1	城市	66	2.43	0.467	1.065	0.288	4	A.大一	142	2.42	0.470	18.411	0.000	多重比较
	农村	218	2.36	0.490				B.大二	90	2.50	0.437			
2	学生干部是	N	均值	标准差	t	p		C.大三	54	2.04	0.454			C<A, B
	否	104	2.23	0.341	-2.339	0.020	5	专业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	多重比较
3	学历	本科	159	2.28	0.474	-3.731	0.000	A.文科	50	2.66	0.409	11.669	0.000	A>B
								B.理科	222	2.31	0.483			
								C.工科	3	2.25	0.409			
	专科	127	2.49	0.473										

境、评价标准来判定是积极还是消极应对方式。为了方便研究,本文所用到的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

2 拖延和应对方式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性分析

2.1 拖延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性分析
经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的拖延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p=0.288>0.05$),尚不能认为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不同;是否学生干部的学生拖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t=-2.339, p=0.021<0.05$),可以认为是否学生干部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不同,且学生干部组拖延行为得分

(2.23 ± 0.341) 低于非干部组 (2.68 ± 0.567); 不同学历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t=-3.731, p<0.001$), 可以认为不同学历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不同,且专科学生拖延行为得分 (2.49 ± 0.473) 高于本科学生 (2.28 ± 0.474); 不同年级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F=18.411, p<0.001$), 可以认为不同年级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不同,且经多重比较(LSD),大三组学生拖延行为得分均低于大一和大二组,其余组别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专业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F=11.669, p<0.001$), 可以认为不同专业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不同,且经多重比较(LSD),文科组拖延

表2 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应对方式差异比较

应对方式	家庭所在地		N	均值	标准差	t	p	4	年级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	多重比较
	城市	农村													
1	城市	67	2.36	0.551	2.491	0.016			A. 大一	142	2.02	0.452	2.355	0.097	
	农村	218	1.97	0.425					B. 大二	91	1.92	0.399			
2	城市	67	1.22	0.598	1.202	0.233			C. 大三	54	2.06	0.418			
	农村	220	1.12	0.490					A. 大一	142	1.21	0.507	8.866	0.000	
3	学生干部	N	均值	标准差	t	p			B. 大二	93	1.20	0.575			
	是	104	2.07	0.434	2.310	0.022			C. 大三	54	0.88	0.329			C<A, B
4	否	176	1.95	0.427			5	专业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	多重比较	
	是	104	1.09	0.505	-1.415	0.158		A. 文科	50	1.91	0.514	1.996	0.138		
5	否	178	1.18	0.525				B. 理科	221	2.03	0.409				
	3	学历	N	均值	标准差	t	p		C. 工科	3	1.81	0.411			
6	本科	160	1.97	0.428	-0.942	0.347		A. 文科	50	1.33	0.520	4.605	0.011	A>B	
	专科	127	2.02	0.437				B. 理科	222	1.09	0.501				
7	本科	162	1.05	0.456	-3.290	0.001		C. 工科	3	0.96	0.564				
	专科	127	1.26	0.566											

行为得分 (2.66 ± 0.409) 高于理科组 (2.31 ± 0.483), 其余组别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应对方式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经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如表10所示, 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的积极应对存在显著差异 (t=2.491, p=0.016<0.05), 且城市组得分 (2.36 ± 0.551) 高于农村组 (1.97 ± 0.425)。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的消极应对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5), 尚不能认为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的消极应对存在不同; 否学生干部学生的积极应对存在显著差异 (t=2.310, p=0.022<0.05), 且学生干部组得分 (2.07 ± 0.434) 高于非干部组 (1.95 ± 0.427)。是否学生干部学生的消极应对不存在显著差异 (p=0.158>0.05), 尚不能认为是否独生子女学生的消极应对存在不同。

不同学历学生的消极应对存在显著差异 (t=-3.290, p=0.001<0.05), 且专科组得分 (1.26 ± 0.566) 高于本科组 (1.05 ± 0.456)。不同学历学生的积极应对不存在显著差异 (p=0.347>0.05), 尚不能认为不同学历学生的积极应对存在不同; 不同年级学生的消极应对存在显著差异 (F=8.866, p<0.001), 且经多重比较 (LSD), 大三组得分均低于大一和大二组, 其余组别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年级学生的积极应对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97>0.05), 尚不能认为不同年级学生的积极应对存在不同; 不同专业学生的消极应对存在显著差异 (F=4.605, p=0.011<0.05), 且经多重比较 (LSD), 文科组得分 (1.33 ± 0.520) 高于理科组 (1.09 ± 0.501), 其余组别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学生的积极应对不存在显著差异 (p=0.138>0.05), 尚不能认为不同专业学生的积极应对存在不同。

3 拖延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表3 拖延行为与应对方法的相关分析

	拖延行为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拖延行为	1		
积极应对	-0.327**	1	
消极应对	0.446**	-0.140*	1

注:**.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经Pearson相关分析, 拖延行为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327。拖延行为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446。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140。

综上3表, 可得出如下结论, 学生干部的拖延水平低于非学生干部, 结合实际情况, 可能是学生干部普遍是较为优秀的学生, 各方面较普通学生能力强一

些, 也有除学业以外的更多任务待完成; 同理, 专科生的拖延水平比本科生高; 高年级的拖延水平较低年级略高;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生不再像刚刚入学那样充满斗志, 在态度上发生懒惰、懈怠等情绪; 文科生高于理科生, 可能是由于专业特点的不同, 理科生思维较简洁、效率较高。应对方式的差异性分析表现如下特点: 学生干部得分高于非学生干部; 文科生高于理科生; 高年级学生低于低年级学生; 农村学生低于城市学生, 分析原因, 可能是学生干部、文科生、低年级学生、城市学生在处理压力事件和应激性事件的能力普遍高于对照组学生。^[3]

从拖延行为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上可以看得出, 两者呈负相关, 其中, 拖延行为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 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 分析原因, 可能是经常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的学生更自律, 有用更强的自控力, 可以在拖延行为发生的时候及时采取应对降低拖延行为的发生几率, 或降低拖延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经常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的学生则在以上方面存在欠缺。

基金项目:

广西科技大学科学基金项目: 高校医学生学业拖延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以广西科技大学医学院为例。项目编号: 校科社1711307。

[参考文献]

- [1] 白金. 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及应对方式[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9(06): 164-165.
- [2] 刘桂荣, 逯春. 完美主义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 青少年学刊, 2018, (06): 31-35.
- [3] 柯丹露, 谢威士.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拖延行为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8, 20(6): 155-160.
- [4] Ellis A, & Knaus W J. Overcoming Procrastination-Productivity Skills[M]. New York: Signet Books, 2013: 2-36.

作者简介:

郭融融(1990--), 女, 达斡尔族, 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教师, 讲师, 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心理学。